

儿童长期多维贫困、动态性与致贫因素^{*}

葛 岩 吴海霞 陈利斯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0—2011年的连续追踪调查数据,结合多维贫困理论和持续时间分析法,构建了反映儿童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贫困持续时间的长期多维贫困指数,并从动态视角分析了中国儿童的跨期贫困状况、城乡差异及其致贫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当贫困临界值为0.3,贫困持续期为3期时,全国49.55%的儿童陷入长期多维贫困,且农村长期多维贫困的儿童比例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and 城市地区;在儿童多维贫困的4个维度、11个指标中,儿童入学、家庭照顾、时间自由和信息获取在不同持续期内对儿童多维贫困的综合贡献度超过70%。在影响儿童长期多维贫困的4个维度、11个指标中,户主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态、家庭人口数、社会关系、家庭收入以及区位因素对儿童多维贫困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儿童贫困 长期多维贫困 动态性 致贫因素

作者简介:葛 岩,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讲师,100081;

吴海霞,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讲师,710119;

陈利斯,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硕士研究生,710119。

中图分类号:F0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18)07-0018-16

一、引言

贫困是当今世界最尖锐的社会问题之一,是反映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后,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一些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如贫困问题日渐凸显,成为摆在政界和学术界面前亟待解决的经济及社会问题。我国大规模扶贫开发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扶贫工作成效显著。但长期以来,中国贫困居民底数不清、情况不明、针对性不强、扶贫资金和项目指向不准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扶贫的准确性及时效性。2013年国家提出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金融因素对玉米价格波动的传导机制及预测效果研究:基于粮食金融化视角”(71603153);陕西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陕西玉米全产业链价值融合及增值创新模式研究”(2016D00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专项资金项目“黄土高原旱地小麦化肥农药减施技术综合效益评价”(GK201803092)。同时感谢安徽大学农村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给予的特别资助。

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扶贫工作开始了从粗放扶贫到精准扶贫的重大转变,而这一转变的首要支撑即为贫困的识别。20 世纪 70 年代前,家庭收入的高低和个体理论上的最低生存需求,是判别贫困的主要依据,如世界银行确定的一天一美元的极端贫困和一天两美元的贫困标准。自 Sen(1976)提出“能力贫困”后,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贫困应当表现为福利的缺失而非收入的高低,收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影响家庭或个体获取福利的多寡,但有些福利如公共产品的享用等,则与收入水平无关,由此学术界对贫困问题的研究逐渐转向了多维。在多维贫困的研究中,以家庭为单位的多维贫困的识别、广度、深度、长期性和脆弱性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和焦点问题(Johnson 和 Schoeni, 2011; 万广华等, 2014; 宋扬、赵君, 2015; 郭熙保、周强, 2016; 王增文, 2017)。

作为家庭成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家庭成员中脆弱性最强的部分,儿童^①的贫困问题由于其长期性和复杂性而备受关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将贫困儿童定义为:“经历过生存、发展和成长所需的物质、精神和情感资源的剥夺,而不能享受其权利,不能发挥其潜能或作为完整、平等的成员参与到社会中的儿童”。这一定义给出了贫困儿童的几个显著特征:第一,剥夺,生存、成长过程中发挥潜能所需的物质、精神和情感资源匮乏;第二,排斥,遭遇不公正待遇,生存受到威胁,话语、权利和尊严被否定;第三,脆弱性,缺乏必要的社会能力去应对其生存和威胁。因此,有必要将儿童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考察其贫困状况。

但是,目前我国扶贫政策更侧重于整体和区域,对特殊群体,尤其是贫困儿童关注力度不足,因而对儿童贫困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儿童时期是个体成长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又是人的生命周期中极易陷入贫困的阶段,该阶段的成长经历和身心健康将对人的一生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一时期经历贫困不仅伴随儿童的成长经历,还将影响其成年后对待社会及家庭的态度,这一影响是长期的、多面的。Duncan 等(2010)、Engle 和 Black(2008)、Grantham-McGregor 等(2007)、Holzera 等(2008)、Johnson 和 Schoeni(2011),以及 Magnuson 和 Votruba-Drzal(2009)通过对埃塞俄比亚等发展中国家贫困儿童的跟踪调查已经证实,儿童成长过程中的贫困剥夺会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如学习成绩不佳、健康状况不良、较低的社会地位、不良的行为举止、匮乏的生活技能以及持续的成年贫困等。更为重要的是,儿童时期是个体认知和身体成长的关键时期,儿童贫困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阻碍了该阶段儿童基本能力的培养,也将阻碍儿童成年后多方面技能获取的能力,其贫困的长期影响可能通过代际传递导致家庭甚至国家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因此,强化对贫困儿童的社会关注,建立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不仅可以提高对贫困儿童的社会保护,还可从一定程度上增强社会阶层间的流动性,促进社会的公平发展。

应对儿童贫困,了解儿童贫困程度是首要任务,而确定儿童贫困剥夺指标则是重中之重。最早的研究将儿童贫困用家庭收入和消费来诠释,但这一衡量方法忽略了儿童与成人贫困的不同以及家庭收入与分配在儿童这一群体的差异,在后来的研究中受到普遍质疑。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和交易成本的存在,非货币性资产和服务的获得并不一定与收入水平紧密相关,较高的家庭收入水平不一定带来儿童福利水平的增加,这一现象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以家庭为单位的单维收入水平来测量儿童的贫困状况并不合理(Dieden 和 Gustafsson, 2003; 谭燕芝等, 2017),这要求我们根据儿童这一特殊群体构建具体的多维贫困剥夺指标。联合

^①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将儿童定义为 18 周岁以下的任何人,这与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自 2007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中规定的“未成年人”(未满 18 周岁的公民)的年龄界定相同。由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根据儿童年龄进行了区分调研,且调研的主体儿童为 6~16 周岁的适龄教育儿童,因此,本文所指儿童年龄定位为 6~16 周岁。

国儿童基金会在基于贫困儿童权利剥夺的视角下,首次全面地给出了儿童多维贫困的评价指标 (United-Nations, 2007), 包括儿童享有的基本权利、充足的营养、体面的生活条件以及服务和信息的可获得性四个维度。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使用多维度测度儿童贫困, 随后亦有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儿童多维贫困指标进行了调整和完善 (Gordon 和 Nandy, 2012; Birhanu 等, 2017), 认为除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出的四个维度外, 父母的照顾和生活自由也是非常重要的儿童多维贫困衡量指标。

另一方面, 儿童贫困剥夺的动态性特征也是研究儿童贫困问题需要解决的重点, Addison 等 (2008) 指出, 儿童贫困的动态性、多维概念和测算、跨学科视角下儿童减贫政策的优化是当前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基于时间分析的视角, 贫困的测算可分为静态和动态的视角。静态贫困是贫困动态变化的结果, 是固定时点上贫困最终状态的表示, 因此难以反映贫困的动态程度。而且, 儿童的基本特征、经济能力及社会地位随时间的演进将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 这将对儿童进入和退出贫困状态产生直接影响, 进而影响某一地区甚至国家层面儿童贫困的整体水平。因此, 聚焦儿童贫困的动态性研究具有以下优势: (1) 儿童当年的生活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前一年的贫困状态, 长时间陷入贫困的儿童比新进入贫困状态的儿童面临的贫困剥夺更为严重; (2) 着眼于不同时期每个儿童经历的贫困状况的动态变化, 有助于揭示贫困是小部分儿童经历的短期行为还是更大范围内的长期社会问题; (3) 儿童时期经历贫困的时间长短和程度将影响儿童成年后的家庭状况及生活态度, 儿童贫困是社会动态贫困研究的基础; (4) 聚焦于儿童贫困的进入和退出有助于揭示贫困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动态贫困的主要推动力量, 如儿童贫困率的上升是由于进入贫困的儿童数量增加还是退出贫困的儿童数量减少所引起的; (5) 多数政策的设计目标在于减少贫困儿童的数量, 而这一政策效果取决于儿童贫困的动态衡量, 若贫困儿童的变动率较低, 贫困政策的制定应集中在生活条件较差且长时间经历贫困状态的儿童层面。因此, 基于面板数据的儿童动态贫困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优化扶贫政策, 提高扶贫效果。

此外, 综合现有文献, 不难发现, 现有对儿童贫困的研究, 很少有学者从不同层面来分析儿童致贫因素 (陈宗胜等, 2013; 宋扬、赵君, 2015)。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我们经常发现贫困人口往往聚集在同一个地区, 其原因是相似的微观环境所致, 除贫困家庭或人口自身因素外, 还具有明显的区域相似性或同质性 (郭建宇、吴国宝, 2012; 章元等, 2013; 叶初升等, 2013; 王春超、叶琴, 2014)。另一方面, 城乡贫困儿童由于宏观环境的制约, 贫困剥夺程度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 使得地理条件成为影响儿童贫困的主要因素之一。此外, 儿童更多地依赖家庭而存在, 家庭特质如人力资本、收入和资产等方面的差异亦是儿童贫困的影响因素之一, 同时还将加剧贫困儿童获得外部机会的不平等。

综上, 本文的主要贡献表现在: 第一, 对多维贫困的研究从家庭层面扩展到儿童层面, 针对儿童这一群体的独特性, 设计具体可行的儿童多维贫困指标; 第二, 在研究方法和思路上, 结合 Foster (2009) 的跨期持续时间分析法, 将 A-F 方法的静态视角拓展到跨期动态视角, 避免了静态分析对时间变量的忽视; 第三, 在贫困指数的构建方面, 在传统 A-F 多维贫困指数的基础上, 引入贫困持续时间临界值, 使儿童贫困指数不仅可以反映儿童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 还可反映出儿童贫困的持续时间, 从而对儿童贫困的测算更加深化和全面; 第四, 在实证手段方面, 在度量了中国儿童长期贫困指数后, 运用面板效应模型, 从人口特征、社会资本、家庭资本和区位特征四个层面展开探讨, 剖析中国儿童多维贫困的主要致贫因素。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说明

(一) 研究方法

假设社会在一定时期内对 n 个儿童 d 项指标进行了 T 次调查,在时点 t 上对儿童 i 的第 j 项指标的取值记为 x_{ij}^t ,有 $x_{ij}^t \geq 0 (i=1,2,\dots,n; j=1,2,\dots,d; t=1,2,\dots,T)$,用行向量表示为 $x_i^t = (x_{i1}^t, x_{i2}^t, \dots, x_{id}^t)$,列向量为 $x_j^t = (x_{1j}^t, x_{2j}^t, \dots, x_{nj}^t)^{-1}$ 。 d 项指标上的被剥夺临界值或贫困线分布记为向量 $z = (z_1, \dots, z_d)$,其中,临界值 $z_j (z_j > 0)$ 表示某儿童在第 j 项指标上的被剥夺临界值或贫困线。需要明确的是, $z = (z_1, \dots, z_d)$ 临界值在每个时点上都是确定不变的。

引入单个指标的指示函数 $g_{ij}^t(z)$ 以方便公式推导。当 $x_{ij}^t < z_j$ 时,赋予 $g_{ij}^t(z) = 1$,表示在时点 t 上,儿童 i 在第 j 项指标上属于贫困儿童,反之 $g_{ij}^t(z) = 0$ 。这里 $g_{ij}^t(z) = 1$ 或 $g_{ij}^t(z) = 0$ 的表示法主要为方便后续多维贫困的识别,并无任何经济理论含义。

给定儿童多维贫困临界值为 k ,令加权总指数 $c_i^t = \sum_{j=1}^d w_j g_{ij}^t(z)$,根据 A-F 方法,加总的多维贫困程度指数 M_0' 表示为:

$$M_0'(x_{ij}^t, w_j, z_j, k) = \frac{1}{n} \sum_{i=1}^n [I(c_i^t \geq k) \sum_{j=1}^d w_j g_{ij}^t(z)] = H_0' \times A_0' \quad (1)$$

其中 H_0' 代表多维贫困的儿童占儿童总人数的比重, A_0' 代表所有多维贫困儿童平均被剥夺的维度数占总维度数的比重。 A_0' 指数与 H_0' 指数共同构成了 M_0' 指数,且两者同 M_0' 指数均呈正向关系。

在长期多维贫困概念模式下,对长期多维贫困儿童的识别共包括 3 个临界值:一是单个指标的贫困临界值 z_i ,用于表示儿童单个指标上的贫困状况;二是多维贫困临界值 k ,用来判断在综合考虑所有福利指标后,在特定时点 t 上某个儿童是否遭受多维贫困;三是持续时间临界值 τ ,用以判断跨期时间段内某个儿童是否遭受长期多维贫困。综合考虑三个临界值 z_j, k, τ ,可计算儿童的长期多维贫困指数,用 M_0^c 表示(以区别 M_0'),我们对 M_0^c 按照 A-F 多维贫困分解方法做相似的分解,即:

$$\begin{aligned} M_0^c(x_{ij}^t, z_j, k, \tau, w_j, w_t) &= \frac{1}{n} \sum_{i=1}^n \{ I[\sum_{t=1}^T w_t \times I(c_i^t \geq k) \geq \tau] \times \frac{1}{T} \sum_{t=1}^T \sum_{j=1}^d w_j g_{ij}^t(z) \} \\ &= \frac{1}{n} \sum_{i=1}^n \{ I[\sum_{t=1}^T w_t \times I(c_i^t \geq k) \geq \tau] \times \frac{1}{T} \sum_{t=1}^T w_t c_i^t \} = H_0^c \times A_0^c \times D_0^c \end{aligned} \quad (2)$$

儿童长期多维贫困指数 M_0^c 可分解为三部分:其中 H_0^c 与 A_0^c 和静态模式下定义相同, D_0^c 为儿童长期多维贫困持续时间指数,即贫困时期数占所有观察期的比重。 H_0^c 指数、 A_0^c 指数、 D_0^c 指数可表示为:

$$H_0^c(x_{ij}^t, z_j, k, \tau, w_j, w_t) = \frac{1}{n} \sum_{i=1}^n \{ I[\sum_{t=1}^T w_t \times I(c_i^t \geq k) \geq \tau] \} \quad (3)$$

$$A_0^c(x_{ij}^t, z_j, k, \tau, w_j, w_t) = \frac{\sum_{i=1}^n \{ I[\sum_{t=1}^T w_t \times I(c_i^t \geq k) \geq \tau] \times \sum_{t=1}^T c_i^t \}}{\sum_{i=1}^n \{ I[\sum_{t=1}^T w_t \times I(c_i^t \geq k) \geq \tau] \times \sum_{t=1}^T I(c_i^t \geq k) \}} \quad (4)$$

$$D_0^c(x_{ij}^t, z_j, k, \tau, w_j, w_t) = \frac{\sum_{i=1}^n \{I[\sum_{t=1}^T w_t \times I(c_i^t \geq k) \geq \tau] \times \sum_{t=1}^T I(c_i^t \geq k)\}}{n \times H_0^c \times T} \quad (5)$$

与多维贫困指数 M_0^t 类似,长期多维贫困指数 M_0^c 也可以就某个指标进行分解,从而推导出单个指标对儿童长期多维贫困的边际贡献度 β_j^c ,即:

$$\begin{aligned} \beta_j^c &= \frac{\frac{1}{n} \sum_{i=1}^n \{I[\sum_{t=1}^T w_t \times I(c_i^t \geq k) \geq \tau] \times \frac{1}{T} \sum_{t=1}^T w_t w_j g_{ij}^t(z)\}}{M_0^c} \\ &= \frac{\sum_{i=1}^n \{I[\sum_{t=1}^T w_t \times I(c_i^t \geq k) \geq \tau] \times \sum_{t=1}^T w_t c_i^t\}}{n \times M_0^c \times T} \end{aligned} \quad (6)$$

其中有 $\sum_{j=1}^d \beta_j^c = 1$, 且 $0 < \beta_j^c \leq 1$ 。

(二) 儿童多维贫困指标的确定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该数据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与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口中心合作,在 1989—2011 年期间对辽宁、江苏、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贵州、黑龙江省同一人群的社会经济状况、卫生服务、居民膳食结构和营养状况进行了九次追踪调查。2011 年开始将北京、上海和重庆纳入调查研究,调研省份扩大到 12 个,样本覆盖了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具有较高的代表性、权威性和可靠性。

本文旨在通过追踪调研数据反映中国儿童长期多维贫困状况及其致贫因素,因此,对数据的完整性和稳定性要求较高。通过分析发现,CHNS 调查样本在 2000 年以前损失变动较大,致使样本的完整性和稳定性难以保证。因此,本文删除了 2011 年新增的上海、北京和重庆的调查数据和 1997 年及以前所有省份的调查数据,在数据处理方法上,删除了指标的缺失值和异常值,获得了 2000 年、2004 年、2006 年、2009 年、2011 年 5 个调查年度,包括辽宁、江苏、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贵州、黑龙江等九省在内的儿童动态追踪面板数据。并考虑后续贫困儿童致贫因素的确定,我们对 2000—2011 年参与追踪调查的儿童及其所在家庭进行匹配,保留了 5 个调查年度均参与调查的儿童及其家庭有效样本 1676 个(每年)。

本文的儿童多维贫困维度与指标的选取参考了普林斯顿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的研究,同时结合现有的文献及与儿童特质相关的指标,最终确定了衡量儿童多维贫困的 4 个维度 11 个指标,分别为:(1)教育水平:6~16 岁儿童的入学情况;(2)健康状况:包括医疗保险、及时就医和营养状况;(3)生活条件:包括卫生设施、干净饮用水、居住环境和家庭用电;(4)个体成长:包括家庭照顾、时间自由和信息获取。具体指标解释见表 1。需要说明的是,(1)我国从 1986 年已开始实施 9 年义务教育,我们可以认定 2000 年以后的适龄儿童受教育程度应满 9 年,因此教育成效的临界缺失值为 9 年;(2)我国 2007 年修订后的《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规定,家庭住房中人均居住面积不少于 15 平方米,因此本研究把 15 平方米作为儿童居住环境的临界缺失值。

确定了多维贫困的指标后,对多维贫困的加总计算,非常关键的一步就是指标权重的确定。但现有文献对指标权重如何赋值并未取得一致看法(Chowdhury 和 Squire, 2006; Decancq 和 Lugo, 2013)。本文在研究儿童多维贫困程度时借鉴国内外大部分贫困研究者(郭熙保、周强,2016;张全红、周强,2015;Alkire 和 Seth, 2015;Alkire 和 Foster, 2011)在研究家庭贫困中采取的等权重方法,

即维度与指标的等权重,给予衡量儿童多维贫困的四个维度:教育水平、健康状况、生活条件和个体成长均为 1/4 的权重,每个权重下的各个指标同样采用等权重的方法。不可否认,该方法忽视了具体年份贫困指标的相对变化及其重要性,但总体而言,由于权重赋值的稳定性,且衡量儿童多维贫困的指标共有 11 个,每个指标的微小变化对总体的加权贫困总指数影响不大,对结果的可比性影响不大。^①

表 1 儿童多维贫困维度、指标、权重及剥夺临界值				
维度	指标	权重	指标解释	临界值
教育水平	儿童入学	1/4	家中 6~16 周岁儿童平均受教育年限	9 年
健康状况	医疗保险	1/12	儿童是否有医疗保险	定性变量,贫困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及时就医	1/12	当儿童感到不舒服时是否去诊所或医院看病	定性变量,贫困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营养状况	1/12	儿童是否营养不良导致身体过瘦	定性变量,贫困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生活条件	卫生设施	1/16	厕所类型,不能使用室内冲水、室内马桶判定为贫困	定性变量,贫困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干净饮用水	1/16	室内或院内无自来水或井水深度超过 5 米,判定为贫困	定性变量,贫困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居住环境	1/16	儿童人均居住面积	15 平方米
	家庭用电	1/16	家中照明常用的能源为煤油、蜡烛等,判定为贫困,电力则为非贫困	定性变量,贫困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个体成长	家庭照顾	1/12	母亲不是儿童主要的生活照顾者,判定为贫困	定性变量,贫困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时间自由	1/12	6 岁及以上儿童每天参加家务劳动的时间	2.5 小时
	信息获取	1/12	父亲或母亲每周陪儿童看电视的次数	2 次

三、动态多维贫困的测度及分解

(一)中国儿童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

由公式(2)可知,儿童动态多维贫困程度与时间维度的确定关系密切。当贫困临界值为 0.3,考察不同时间维度下儿童的多维贫困发生率情况。由公式(1)我们可确定本文总的时间跨度为 5 期,即 $T=5$, $\tau=1/5$ 表示儿童在观察期 T 内平均有 1 期处于多维贫困状态, $\tau=5/5=1$ 表示儿童在

① 我们采用等权重方法对儿童多维贫困的指标进行了赋值,并采用 DEMATEL 方法对儿童多维贫困指标的赋值敏感性进行验证。结果发现,无论 DEMATEL 法或主观等权重赋值法,各指标权重虽有差异,但相差不大。详细过程可向作者索要。

全部观察期内均处于多维贫困状态,即儿童陷入了持久的多维贫困。

前述理论部分我们已经将儿童动态贫困做了分解,在儿童静态多维贫困的基础上加入儿童跨期变动的时间因素,可以测算儿童长期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情况。而儿童长期多维贫困的认定,首先即为贫困持续期的确定。由公式(2)可知,儿童长期多维贫困受儿童贫困持续期的影响,但现有研究中,就长期贫困持续时间的确定并无一致结论,在本文中我们设定,若在调研年度持续期内,儿童在超过50%的观察期内处于贫困状态,该儿童则被认定为遭受长期多维贫困。在本文中,调研时期共为5期,即 $T=5, \tau=3/5$ 表示某儿童在3个观察期内处于贫困状态,则该儿童被判定为长期多维贫困儿童。同时考虑到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在研究儿童长期多维贫困中,我们将样本按区位进行了分类。

图1给出了不同临界值条件下中国儿童总体长期多维贫困、农村儿童长期多维贫困和城市儿童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状况。儿童长期多维贫困呈现以下特征:(1)随着儿童贫困临界值的提高,全国总体、城市和农村地区儿童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不断下降,这一趋势表明,随着多维贫困临界值的提高,参与调查的儿童在追踪年份中被识别为长期多维贫困的儿童比例越来越低。(2)农村地区陷入长期多维贫困的儿童比例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城市地区,这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人口福利的差异关系密切(徐超、李林木,2017)。(3)随着 k 值的等比例变化,陷入长期贫困的儿童比率并非等比例变动。以全国儿童总体长期多维贫困为例,当多维贫困临界值为0.1时,儿童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为85.33%,当多维贫困临界值为0.3时,儿童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为49.55%,下降幅度为35.78个百分点;当多维贫困临界值为0.5时,儿童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为26.01%,下降幅度为23.54个百分点;当多维贫困临界值为0.7时,儿童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为9.11%,下降幅度为16.90个百分点;当多维贫困临界值为0.9时,儿童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为0.00%,即基本没有儿童陷入长期多维贫困,其下降幅度为8.11个百分点。(4)当 $0 < k < 0.3$ 时,有一半以上的儿童陷入长期多维贫困,这说明长期多维贫困儿童主要在部分关键指标下被剥夺的程度较深,儿童多维贫困的指标贡献度较为集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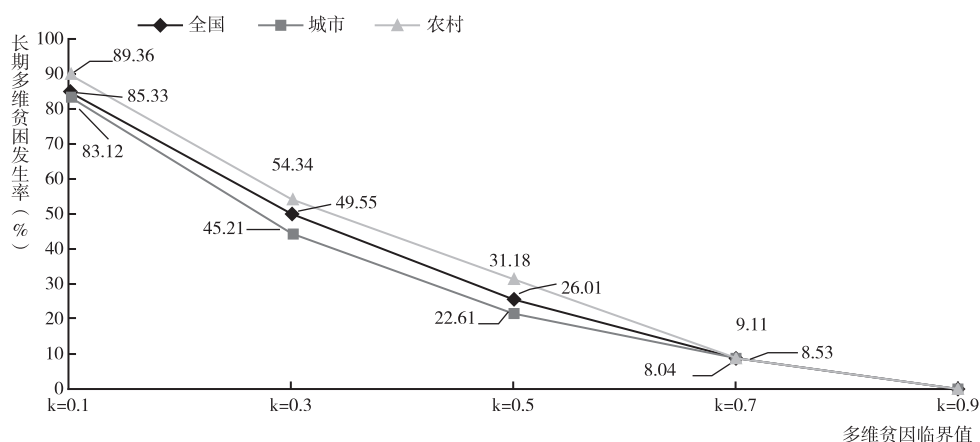


图1 不同贫困临界值下儿童多维贫困发生率

(二) 儿童长期多维贫困被剥夺份额

儿童所遭受的多维贫困缺失程度即为多维贫困的被剥夺份额,图2给出的是不同贫困临界值下城乡儿童长期多维贫困平均被剥夺份额。从图2可以看出,随着贫困持续期的增加,儿童多维

贫困被剥夺份额逐渐上升,但这一过程在全国、农村和城市地区并非等比例上升,农村地区儿童长期多维贫困被剥夺份额上升趋势最为显著。相比之下,城市地区儿童长期多维贫困被剥夺份额上升趋势较为缓慢,说明随着贫困持续时间的加深,儿童贫困被剥夺深度向着不利于农村儿童的方向发展。这一结论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下乡村经济发展落后、人口福利薄弱的结论相一致。农村地区由于基础设施及生活资料的匮乏,儿童致贫返贫机率较大,陷入贫困的风险较大,贫困脆弱性也较高,若在短时间内没有及时摆脱贫困,一旦陷入长期多维贫困,将会面临更深的贫困剥夺。因此,未来中国针对儿童的贫困政策重点仍在农村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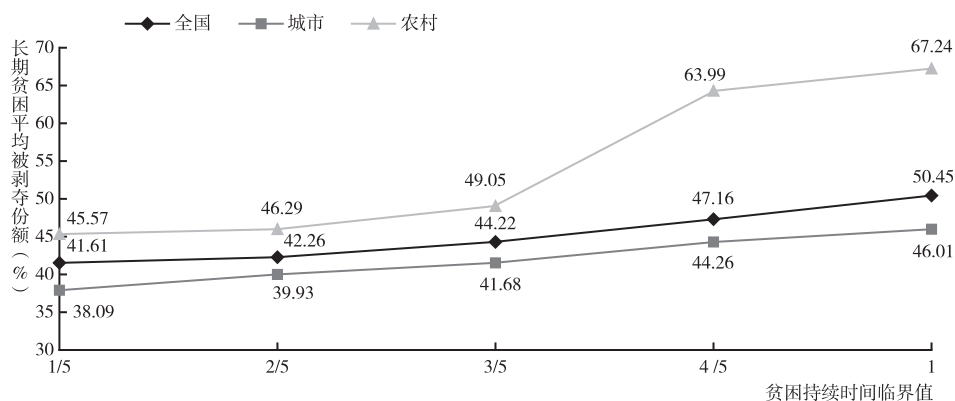


图2 不同贫困临界值下城乡儿童长期多维贫困平均被剥夺份额

(三) 儿童长期多维贫困的动态性

1. 儿童长期多维贫困指数

儿童长期多维贫困指数描述了贫困儿童在观察期内的平均贫困深度和贫困的持续时间,因此,儿童长期多维贫困指数由三个部分构成,即儿童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儿童长期多维贫困的深度以及儿童长期多维贫困的持续时间,该指数综合反映了儿童在多维贫困各指标上的福利被剥夺情况以及在长期内儿童的脱贫能力。

表2呈现了不同贫困持续时间临界值下城乡儿童长期多维贫困的深度及平均持续时间的动态转化趋势。由表2可以看出:(1)随着贫困持续期的延长,全国儿童多维贫困指数大幅度下降。以全国平均水平为例,在一个观察期内,儿童陷入多维贫困的程度为22.19%;当把持续期扩大到3个观察期,儿童陷入多维贫困的程度为19.85%;当把持续期扩大到5个观察期,儿童陷入多维贫困的程度为6.26%。(2)随着观察期的均匀变动,儿童长期多维贫困的平均程度在从3期到4期、4期到5期的过渡过程中呈现“断崖式”下降。以农村地区为例,儿童长期多维贫困在3、4、5个持续期内的多维贫困指数分别为23.90%、19.03%和9.71%,在从3期到4期、4期到5期的下降幅度分别为4.87和9.32个百分点。(3)相较于城市地区,农村儿童的长期多维贫困深度偏离全国平均水平的程度更为明显。

观察极端情况,当 $\tau=1$ 时,即儿童在全部5个观察期内均处于多维贫困的状态,全国、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儿童多维贫困深度分别为6.26%、4.43%和9.71%,表明在全部5个观察期内,全国、城市和农村地区约有6.26%、4.43%和9.71%的儿童处于长期极度贫困状态。这一比例的儿童应是我国扶贫政策和扶贫工作的重点关注人群,也是目前急需扶贫的对象。

表 2 不同临界值下城乡儿童长期多维贫困指数动态变化 ($k=0.3, \%$)

地区	指标	$\tau=1/5$	$\tau=2/5$	$\tau=3/5$	$\tau=4/5$	$\tau=1$
全国	H_0^c	88.23	77.59	60.55	30.98	12.41
	A_0^c	41.61	42.26	44.22	47.16	50.45
	D_0^c	60.43	65.07	74.12	87.23	100.00
	M_0^c	22.19	21.34	19.85	12.74	6.26
城市	H_0^c	86.54	75.45	58.21	28.31	9.63
	A_0^c	38.09	39.93	41.68	44.26	46.01
	D_0^c	57.27	62.30	71.99	86.03	100.00
	M_0^c	18.88	18.77	17.47	10.78	4.43
农村	H_0^c	92.33	84.37	65.34	33.42	14.44
	A_0^c	45.57	46.29	49.05	63.99	67.24
	D_0^c	63.16	67.31	74.56	88.98	100.00
	M_0^c	26.57	26.29	23.90	19.03	9.71

2. 儿童长期多维贫困指标贡献度

为深入考察各指标对儿童长期多维贫困的影响,本文测度了不同临界值条件下各指标的贫困贡献度 β_j^c ,结果如表3所示。表3中,儿童入学、家庭照顾、时间自由和信息获取在不同临界值条件下对儿童多维贫困的贡献度都较高,该4项指标综合占比超过70%,即儿童入学、家庭照顾、时间自由和信息获取可以解释儿童多维贫困被剥夺指标的70%以上。由于教育的投资回报期较长,诸多家庭在经济条件受限的情况下,往往对子女受教育程度不够重视,通过教育来改变子女及家庭生活状态的意愿不强烈。由于儿童这一群体的特殊性和脆弱性,使得相较于其他家庭成员,儿童往往需要更多的照顾和关注,而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对母亲的依赖和情感寄托使得来自母亲的关爱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儿童性格及成长的重要影响因素。相较于较为富裕的家庭,贫困家庭的儿童在日常生活中参与家务劳动的时间往往更长,这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儿童社交及自由支配的时间。同时儿童成长过程中信息资源的获取是否通畅也对儿童贫困有重要影响。由于儿童所处的年龄阶段是信息和知识输入的关键时期,而儿童又相对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因此,在获取外部信息资源时,父母的参与意义重大。

表 3 不同临界值下儿童长期多维贫困各指标贡献度(以全国整体样本为例,%)

维度	指标	$\tau=1/5$	$\tau=2/5$	$\tau=3/5$	$\tau=4/5$	$\tau=1$
教育水平	儿童入学	26.25	25.92	26.72	27.90	28.00
健康状况	医疗保险	6.47	6.62	7.03	5.11	5.97
	及时就医	1.54	1.62	1.21	1.77	1.82
	营养状况	2.77	2.65	2.64	2.31	2.08
生活条件	卫生设施	6.14	6.29	6.73	7.01	7.26
	干净饮用水	1.96	1.94	1.65	1.62	1.59
	居住环境	0.99	0.93	0.95	0.76	0.64
	家庭用电	1.21	1.33	1.36	1.47	1.49
个体成长	家庭照顾	14.01	14.36	14.17	15.42	15.63
	时间自由	18.69	19.03	19.09	19.32	19.46
	信息获取	19.97	19.31	18.45	17.31	16.06

四、儿童长期多维贫困的致贫因素分析

(一) 致贫因素

为了明确儿童长期多维贫困的致贫因素,结合儿童的成长环境,考虑儿童成长支持主要来自其所在的原生家庭,因此本研究在确定儿童致贫因素时,多考虑与儿童成长相关的家庭特征。关于儿童贫困的影响因素,如表 4 所示,也分为 4 个维度、11 个指标。

维度 1:人口特征。家庭基本人口特征直接决定了儿童日常生活中所接触人群的特征,这部分人群的群体力量将影响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可获取的家庭支持。人口特征包括五个指标:户主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态及家庭人口数。需要说明的是,(1)由于本研究着眼于儿童多维贫困,年龄阶段为 6~16 周岁,CHNS 所调研的户主多为儿童的父母,户主的年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儿童可获得的资源支持水平。一般而言,从生命周期的视角,我们认为,户主年龄与家庭及儿童贫困之间为倒“U”型关系,但由于我们的目标人群为儿童,这个年龄阶段的家庭户主多为青壮年劳动力,在此我们假设随着户主年龄的增长,儿童陷入贫困的程度将下降,二者为负相关关系。(2)户主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态以及家庭人口数对儿童多维贫困的影响不是直接的,已有研究表明,高龄、女性、未婚或离异、低教育水平极易使家庭陷入贫困,进而恶化儿童的成长环境(杨国涛等,2010)。(3)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相较于城市地区,我国农村诸多家庭规模庞大,而随着家庭人口数的增多,家庭资源可分配给每个儿童的部分将会减少,容易引发儿童贫困(杜凤莲、孙婧芳,2011)。

维度 2: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包含两个指标:干部和社会关系。家庭中是否有村干部及以上成员以及家庭可获得的礼金数量衡量的是家庭在必要时可获得的外部支持力量。为平抑波动,我们对家庭可获得的礼金数量取对数,并以 2000 年为基期,用 CPI 指数对 2004 年、2006 年、2009 年和 2011 年的家庭可获得礼金数量进行了去通胀处理。我们假设获得外部支持力量较多的家庭,其儿童陷入贫困的程度较低,二者之间为负相关关系。

维度 3:家庭资本。家庭资本包括三个维度:房屋状况、财产状况和家庭收入状况。是否拥有房屋反映了家庭及儿童基本生活被保障的情况,我们假设拥有房屋产权的家庭,其儿童陷入贫困的机率更低。家庭拥有的财产状况和家庭收入反映了家庭改变儿童生活及教育状况的能力,反映了家庭可以为儿童成长提供的经济支撑,对儿童贫困有直接影响,我们假设家庭资本和收入水平较高的家庭,儿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较小。

维度 4:区位特征。我们用儿童的居住地点来衡量。经济地理学认为生存空间不足是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即为居住环境的恶化,如自然环境恶劣、交通条件不便、水资源匮乏、土地资源贫瘠、自然灾害多发等(胡联等,2011)。当前我国减贫的主要区域集中在边远山区、少数民族聚集区等地理环境较差的地区,这也间接地暗示着地理区位因素影响了家庭及儿童的贫困发生率。我们假设农村地区的儿童由于资源诅咒的因素较易陷入贫困。在回归分析中我们将区位因素单独进行考虑,考察加入或删除区位因素后各因素对儿童多维贫困的影响情况。

(二) 实证结果分析

1. 样本描述性统计

本文选取的数据样本为辽宁、江苏、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贵州、黑龙江等九省 2000 年、

2004 年、2006 年、2009 年、2011 年 5 个调查年度的动态面板数据。由于被解释变量是儿童多维贫困指数,属于 $[0,1]$ 区间连续变量,因而在模型的选择上需要建立连续数据面板模型,因此我们将考虑面板 Tobit 模型。儿童贫困致因主要基于人口特征、社会资本、家庭资本和区位特征的视角,各维度及其指标的统计性描述如表 5 所示。

表 4 各影响因素指标描述及预期符号

维度	指标	指标描述	预期符号
人口特征	户主年龄	描述户主年龄状况的连续变量	-
	户主性别	哑变量,男性 = 1,女性 = 0	-
	户主受教育程度	分层变量,文盲 = 0,小学毕业 = 1,初中毕业 = 2,高中毕业 = 3,大专及以上学历毕业 = 4	-
	婚姻状态	哑变量,未婚或离异 = 1,已婚 = 0	+
	家庭人口数	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家庭总人口数	+
社会资本	干部	哑变量,家庭中有任职为村干部及以上级别的成员,有 = 1,无 = 0	-
	社会关系	家庭在当年收到的礼金折合的货币价值(元),取对数	-
家庭资本	房屋	哑变量,有自己的房屋 = 1,无 = 0	-
	财产状况	哑变量,家庭拥有少于以下资产中的三种(含):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空调、计算机、照相机、电话、手机 = 1,否则 = 0	+
	家庭收入	家庭人均收入(元),取对数	-
区位特征	居住地点	哑变量,居住地点为农村 = 1,城市 = 0	+

表 5 各影响因素的统计性描述

维度	指标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中值	标准差
人口特征	户主年龄	67	19	33.451	35.211	1.288
	户主性别	1	0	0.790	1	0.407
	户主受教育程度	4	0	1.523	2	1.219
	婚姻状态	1	0	0.230	0	0.421
	家庭人口数	13	1	4.233	4.016	1.575
社会资本	干部	1	0	0.028	0	0.165
	社会关系	9.210	2.303	5.859	5.704	0.902
家庭资本	房屋	1	0	0.954	1	0.210
	财产状况	1	0	0.776	1	0.417
	家庭收入	12.903	0.171	7.957	8.007	1.307
区位特征	居住地点	1	0	0.665	1	0.471

由表 5 可知,儿童所在家庭户主平均年龄为 33 岁,户主受教育程度多集中于小学到初中的水平,家庭平均人口数为 4 人,超过 95% 的家庭有自己的住房,超过 66% 的家庭为农村家庭。在儿童贫困的各影响因素中,观察期内波动幅度最大的是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数和家庭收入。

2. 回归估计结果

在进行面板 Tobit 模型回归时,首先应判断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更为有效。给定原假设 $H_0: \sigma_u = 0$,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表 6 中面板 Tobit 模型结果显示,不包含区位因素和包含区位因素的 $\sigma_u = 0$ 的似然比检验分别为 0.006 和 0.005, P 值均为 0.000,故可认为存在个体固定效应,应使用随机效应的面板 Tobit 回归。同时本文给出了弱化样本时间及区位因素的混合效应模型结果做参考,具体回归见表 6。

从人口特征角度看,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户主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态以及家庭人口数显著影响儿童的多维贫困程度,其中随着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儿童陷入多维贫困的程度逐渐降低;女性户主、父母为未婚或离婚状态以及家庭人口数较多的家庭,儿童陷入贫困的程度较深。这一结论与我们的假设预期相一致,也表明家庭基本的人口统计特征显著影响儿童可获得资源状况。随着户主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提升,知识、阅历及家庭财富的积累可以给儿童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已有研究表明,相对于男性户主,女性户主在生产、生活等方面面临的脆弱性和风险性更高(樊丽明、解垚,2014),这种脆弱性和风险性可以通过家庭纽带关系传递给儿童。家庭人口规模越大,意味着家庭消费支出就更大,需要抚育子女、赡养老人的时间成本及物质成本也越高,儿童可以享有的平均福利水平较之家庭规模较小的儿童就会显著下降。

从社会资本角度看,出乎意料的是,家庭成员中是否有干部对儿童多维贫困的程度没有显著影响。从样本的统计性描述可以看出,家庭中有干部成员的比例仅为 2.8%,且多分布在农村地区,这可能弱化了统计指标的显著性。但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家庭一年可收到的礼金数量与儿童贫困显著负相关,即家庭收到的礼金数量越多,该家庭儿童陷入贫困的程度越低。这一结论表明,中国传统的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对家庭及其成员有重要影响,亲缘关系越紧密,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遭受“社会排斥”的可能性越低,陷入贫困的程度就越低。

从家庭资本角度看,家庭拥有的财产状况对儿童贫困程度没有显著影响,而家庭是否拥有自己的房屋和家庭人均纯收入分别在 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儿童贫困程度有显著影响。拥有自己的住所是家庭基本生活条件的底层保障,相比于人均收入较低的家庭,收入水平较高的家庭更有能力从各个方面改善儿童的生活、教育等基本成长条件。但财产状况对儿童贫困没有显著影响,与我们的预期假设不一致。本文将家庭财产定义为家庭拥有少于以下资产中的三种(含):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空调、计算机、照相机、电话、手机,原因可能在于这些家庭固定资产,儿童可自由使用和支配的权力较低,儿童贫困的诸多维度的衡量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家庭财产的缺失,因此家庭拥有的财产状况在回归结果中并不显著。

从区位特征角度看,在上述所有儿童贫困可能的影响因素中,儿童所在的区位因素与儿童长期多维贫困程度显著相关,且农村儿童遭受多维贫困的程度显著高于城市儿童。区位因素对儿童贫困的影响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区位因素对儿童的直接歧视效应。不同区位儿童在享受医疗、教育等基本生存权利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农村儿童在该方面明显处于弱势地位。二是区位因素的间接效应。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乡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阻碍了家庭

获得其他外部收入的机会和能力,这些不利方面会通过对家庭的影响进而影响儿童福利。如 Sicular 等(2007)研究发现,区位因素显著影响着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这一差距的 50% 以上主要由户籍政策引起的城乡分割所造成,这一结论与本文的实证结果基本相符。后续国家扶贫政策应着力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并强化农村弱势群体的“造血”功能,在农村经济资本普遍匮乏的情况下,以国家力量为主导,社会资本广泛参与,科研机构实施第三方评估的“公益服务式”扶贫模式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李博、左停,2017)。

表 6 回归估计结果

维度	指标	不包含区位因素		包含区位因素	
		混合面板回归	面板随机效应	混合面板回归	面板随机效应
人口特征	户主年龄	-0.101 *** (-4.240)	-0.144 *** (-4.790)	-0.120 *** (-4.650)	-0.151 *** (-4.220)
	户主性别	-0.029 * (1.690)	-0.161 ** (-2.200)	-0.025 (1.440)	-0.137 * (-1.900)
	户主受教育程度	-0.171 *** (-4.100)	-0.099 *** (-3.930)	-0.167 *** (-3.580)	-0.197 *** (-3.710)
	婚姻状态	0.042 *** (7.110)	0.085 *** (10.180)	0.141 *** (7.130)	0.094 *** (8.250)
	家庭人口数	0.012 ** (2.090)	0.034 ** (2.140)	0.010 * (1.840)	0.026 * (1.740)
社会资本	干部	-0.008 (-0.140)	-0.018 (-0.750)	0.025 (0.430)	-0.098 (-0.410)
	社会关系	-0.003 (-0.350)	-0.006 (-0.550)	-0.004 (-0.370)	-0.164 ** (-2.140)
家庭资本	房屋	-0.068 (-1.600)	-0.135 ** (-1.980)	-0.070 (-1.470)	-0.136 ** (-2.080)
	财产状况	0.081 (1.240)	0.022 (0.810)	0.062 (0.950)	0.013 (0.460)
	家庭收入	-0.133 *** (-4.900)	-0.202 *** (-4.810)	-0.126 *** (-3.780)	-0.165 *** (-5.700)
区位特征	居住地点			0.110 *** (5.210)	0.558 *** (6.310)
常数项		1.303 *** (4.240)	0.833 *** (6.820)	1.277 *** (4.030)	0.755 *** (7.690)
Ftest		84.780 (0.000)			80.04 (0.000)
R ²		0.280		0.290	
Adj. R ²		0.277		0.286	
Log likelihood			-815.949		-835.642

续表 6

维度	指标	不包含区位因素		包含区位因素	
		混合面板回归	面板随机效应	混合面板回归	面板随机效应
Wald Chi2			1456. 640 (0. 000)		1525. 790 (0. 000)
Sigma_u			0. 008 0. 002		0. 003 0. 000
(LR test of Sigma_u = 0)			0. 006 (0. 000)		0. 005 (0. 000)

注：***、** 和 * 分别表示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回归结果中括号内为 Z 统计值，检验结果中括号内为 P 值。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儿童贫困指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经历的贫困。相比于成人贫困,受生活技能、认知水平及经济能力的限制,儿童贫困呈现出更为显著的不平等性及社会脆弱性,其致贫原因、效应及其对社会的长期影响本质上均有别于成人贫困,需要给予的关注也应更为丰富。本文利用 CHNS 的 2000—2011 年连续追踪调查数据,结合 A-F 多维贫困理论和 Foster 的持续时间分析法,立足中国实际,构建了反映儿童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贫困持续时间的多维贫困指数,并从动态视角分析了中国儿童的跨期贫困状况和城乡差异。结果发现,(1)就儿童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而言,农村地区陷入长期多维贫困的儿童比例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城市地区;随着 k 值的等比例变化,陷入长期贫困的儿童比率并非等比例变动;当 $0 < k < 0.3$ 时,有一半以上的儿童陷入长期多维贫困,这说明长期多维贫困儿童主要在部分关键指标下被剥夺的程度较深,儿童多维贫困的指标贡献度较为集中。(2)农村地区儿童长期多维贫困被剥夺份额上升趋势最为显著,相比之下,城市地区儿童长期多维贫困被剥夺份额上升趋势较为缓慢,说明随着贫困持续时间的加深,儿童贫困被剥夺深度向着不利于农村儿童的方向发展。因此,未来中国针对儿童贫困的政策重点仍在农村地区。(3)在儿童多维贫困的 11 个构成指标中,儿童入学、家庭照顾、时间自由和信息获取在不同临界值条件下对儿童多维贫困的贡献度都较高,该 4 项指标综合占比超过 70%,即儿童入学、家庭照顾、时间自由和信息获取可以解释儿童多维贫困被剥夺指标的 70% 以上。在未来儿童的扶贫工作中,加大对贫困地区儿童教育的投入力度,切实落实九年义务教育,合理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给予儿童成长过程中尽可能多的父母陪伴和自由空间,改善儿童的生活环境,拓宽儿童获取外部信息的渠道。

除此之外,与儿童成长密切相关的家庭特征、区位因素等对儿童多维贫困产生了显著影响。为了明确儿童多维贫困的致贫因素,结合儿童的成长环境,本研究确定了影响儿童成长的 4 个维度、11 个指标。回归结果表明,户主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态、家庭人口数、社会关系、家庭收入以及区位因素对儿童多维贫困的深度有显著影响。这一结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儿童多依附于家庭而存在,其贫困的诱因很大程度上与家庭特征密切相关,要缓解儿童贫困,需要首先帮助其家庭脱离贫困状态,尤其是提高父母双方的受教育程度,并使之保持良好的婚姻关系,为儿童成长提供一个连续且稳定的环境。其次,较为稳定的社会关系,如紧密的亲缘关系是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除家庭之外可以借助的外部力量,因此,国家及当地政府应积极推进贫困落后地区

的精神文明建设,强化区域环境中的社会关系,尤其是亲缘关系。最后,除农村天然的资源禀赋劣势外,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下的户籍制度的歧视性和分割效应是产生农村贫困儿童的一大推动力量。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弱化户籍制度的不利影响,可以预期区位因素的影响将会逐渐弱化甚至消除。但这一过程是漫长的,在这一进程中,如何平衡城乡资源,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兼顾效率和公平是摆在扶贫工作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陈宗胜、沈扬扬、周云波:《中国农村贫困状况的绝对与相对变动——兼论贫困线的设定》,《管理世界》2013年第1期。
2. 杜凤莲、孙婧芳:《贫困影响因素与贫困敏感性的实证分析——基于1991—2009的面板数据》,《经济科学》2011年第3期。
3. 樊丽明、解垚:《公共转移支付减少了贫困脆弱性吗?》,《经济研究》2014年第8期。
4. 郭建宇、吴国宝:《基于不同指标及权重选择的多维贫困测量——以山西省贫困县为例》,《中国农村经济》2012年第2期。
5. 郭熙保、周强:《长期多维贫困、不平等与致贫因素》,《经济研究》2016年第6期。
6. 胡联、孙永生、王娜、倪国华:《贫困的形成机理:一个分析框架的探讨》,《经济问题探索》2011年第3期。
7. 李博、左停:《谁是贫困户?精准扶贫中精准识别的国家逻辑与乡土困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8. 宋扬、赵君:《中国的贫困现状与特征:基于等值规模调整后的再分析》,《管理世界》2015年第10期。
9. 谭燕芝、张子豪、睦张媛:《非正规金融能否促进农户脱贫——基于CFPS 2012年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农业技术经济》2017年第2期。
10. 王春超、叶琴:《中国农民工多维贫困的演进——基于收入与教育维度的考察》,《经济研究》2014年第12期。
11. 万广华、刘飞、章元:《资产视角下的贫困脆弱性分解:基于中国农户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4年第4期。
12. 王增文:《中国农村反贫困绩效的推动因素测度及分解:1978—2014》,《财贸经济》2017年第9期。
13. 徐超、李林木:《城乡低保是否有助于未来减贫——基于贫困脆弱性的实证分析》,《财贸经济》2017年第5期。
14. 杨国涛、东梅、张会萍:《家庭特征对农户贫困的影响:基于青海固分户调查数据的分析》,《农业技术经济》2010年第4期。
15. 叶初升、赵锐武、孙永平:《动态贫困研究的前沿动态》,《经济动态》2013年第4期。
16. 张全红、周强:《中国贫困测度的多维方法和实证应用》,《中国软科学》2015年第7期。
17. 章元、万广华、史清华:《暂时性贫困与慢性贫困的度量、分解和决定因素分析》,《经济研究》2013年第4期。
18. Addison, T., Hulme, D., & Kanbur, R., Poverty Dynamics: Measurement and Understanding from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BWPI Working Paper 19, Manchester: Brooks World Poverty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2008.
19. Alkire, S. & Seth, S.,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Reduction in India Between 1999 and 2006: Where and How? *World Development*, Vol. 72, 2015, pp. 93–108.
20. Alkire, S. & Foster, J. E., Counting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95, No. 7, 2011, pp. 476–487.
21. Birhanu, M. Y., Ambaw, B., & Mulu, Y., Dynamics of Multidimensional Child Poverty and its Triggers: Evidence from Ethiopia Using Multilevel Mixed Effect Model. MPRA Paper, No. 79377, May 25, 2017.
22. Chowdhury, S., & Squire, L., Setting Weights for Aggregate Indices: An Application to the Commitment to Development Index and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42, No. 5, 2006, pp. 761–771.
23. Decancq, K., & Lugo, M. A., Weights in Multidimensional Indices of Well-being: An Overview. *Econometric Reviews*, Vol. 32, No. 1, 2013, pp. 7–34.
24. Dieden, S., & Gustafsson, B., Child Poverty in South Africa: An Assessment Based on Microdata for 199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Vol. 12, 2003, pp. 326–338.
25. Duncan, G. J., Ziol-guest, K. M., & Kalil, A., Early-Childhood Poverty and Adult Attainment, Behavior, and Health. *Child Development*, Vol. 81, 2010, pp. 306–325.
26. Engle, P. L., & Black, M. M., The Effect of Poverty on Child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al Outcomes.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Vol. 1136, No. 1, 2008, pp. 243–256.

27. Foster, J. E. , A Class of Chronic Poverty Measures. In Addison, T. , Hulme, D. , Kanbur, R. (eds.) *Poverty Dynamic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2009, pp. 59 – 76.
28. Gordon, D. , & Nandy, S. Measuring Child Poverty and Deprivation. In: Minujin, A. and Nandy, S. (eds.) *Global Child Poverty and Well-Being: Measurement, Concepts, Policy and Action*. The Policy Press, Bristol, 2012, pp. 57 – 101.
29. Grantham-McGregor, S. , Cheung, Y. B. , Cueto, S. , Glewwe, P. , Richter, L. , & Strupp, B. , Developmental Potential in the First 5 Years for Childre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Lancet*, No. 5, 2007, pp. 60 – 70.
30. Holzer, H. J. , Schanzenbach, D. W. , Duncan, G. J. , & Ludwig, J. , The Economic Costs of Childhood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Children and Poverty*, No. 14, 2008, pp. 41 – 61.
31. Johnson, R. C. , & Schoeni, R. F. , The Influence of Early-Life Events on Human Capital, Health Status,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over the Life Course. *The BE Journal of Economic Analysis & Policy*, Vol. 11, No. 3, 2011, pp. 597 – 601.
32. Magnuson, K. , & Votruba-Drzal, E. , Enduring Influences of Childhood Poverty. *Focus*, No. 26, 2009, pp. 32 – 37.
33. Sen, A. K. , Poverty: An Ordinal Approach to Measurement. *Econometrica*, Vol. 44, No. 2, 1976, pp. 219 – 231.
34. Sicular, T. , Yue, X. , Gustafsson, B. , & Li, S. ,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and Inequality in China.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Vol. 53, No. 1, 2007, pp. 93 – 126.
35. United-Nations, Resolution Adopt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on 19 December 2006. In: ASSEMBLY, G. (ed.), 2007.

Children's Long-term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Dynamics and Causal Factors

GE Yan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100081)

WU Haixia, CHEN Lisi (Shaanxi University, 710119)

Abstrac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continuous study 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 (CHNS) from 2000 to 2011, combining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theory and time duration analysis to create the children's long-term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which reflects the incidence rate, magnitude and duration of children's poverty, and to analyze intertemporal poverty of Chinese children, differe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causal factors of children's poverty from a dynamic prospective. The empirical evidence shows that when the poverty threshold is 0.3 and the poverty duration is three phases, 49.55% of children nationwide suffer from long-term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and the proportion of rural children suffering from long-term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s much higher than both the proportion of urban children and the national average. Among the four dimensions and 11 indicators of children's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school enrolment rate, family care, amount of free time and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have altogether accounted for over 70% for children's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Among the four dimensions and 11 indicators that have influence on children's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the age, gender, education level and marital status of the head of household, family size, social relationship, family income as well as place of residence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children's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Keywords: Children's Poverty, Long-term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Dynamics, Causal Factors

JEL: I3, I32

责任编辑: 无 明